

《文賦》《詩品》注译



# 《文赋》《诗品》注译

周伟民 萧华荣

中州古籍出版社

## 内 容 提 要

陆机《文赋》和钟嵘《诗品》，是我国较早、较系统的两部文学论评专著；但是由于语言简古，一般读者不易读懂，需要有注译本。本书注释详明，译文通俗畅达，为古代文论爱好者阅读提供了方便，亦可资文论研究者参考。

## 《文赋》《诗品》注译

周伟民 萧华荣

责任编辑 许树棣

中州古籍出版社出版  
河南第一新华印刷厂印刷  
河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787×1092毫米 32开 8 印张 152 千字  
1985年1月第1版 1985年1月第1次印刷  
印数：1—9,380册  
统一书号10219·76 定价1.20元

## 导 言

陆机的《文赋》，是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上第一篇全面地探讨文学创作过程的理论专著，它产生于文学的自觉时代，是在曹丕《典论·论文》和前人文学理论成果的基础上发展的一个发展。陆机在《文赋》中，自觉地探索文学自身的特征，并注意到作家个人的品格和情感在创作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首次揭示了“缘情”、艺术构思的秘奥，对文学的风格、文学创作中的应感现象以及作品构成过程中的立意、结构、剪裁、修辞、音韵等许多问题，提出了精辟的见解。它对中国文学理论批评的影响以及对中国文学创作实践的启示，功绩是不可估量的。这里谈谈《文赋》的写作年代、《文赋》与陆机自身的人品、素养以及创作实践的关系、《文赋》的理论与评价等问题。

### 一

《文赋》是陆机在什么时候写的呢？

现存的唐代以前的典籍，没有记载；现在能够看到的最

早涉及《文赋》写作年代的是杜甫的《醉歌行》。杜甫说：“陆机二十作文赋，汝更小年能缀文。”

杜甫这句话，“未晓何本”（钱钟书《管锥篇》第三册）；我们可以理解为陆机二十岁作文写赋，未必是定指《文赋》。杜甫的诗，经过唐代元稹、白居易和宋人的推崇，整理和注释的很多，号称千家；注家们因袭相传，多认为杜甫《醉歌行》中说的是定指《文赋》。清代有影响的注家仇兆鳌的《杜诗详注》和杨伦的《杜诗镜铨》，在注这句诗时都作了极不确切的引证。清代史学家王鸣盛在《十七史商榷》和何焯在《义门读书记》中，都把杜甫这句诗解释为陆机二十岁作《文赋》。当代不少古典文学研究家如郭绍虞、姜亮夫先生等，也持这种看法；于是，《文赋》的撰作年代问题以及因此而引起的对《文赋》的历史评价，就显得十分复杂。

考订《文赋》的撰作年代，杜甫的诗句，是不能作为根据的。最可靠的证据还是陆机和他弟弟陆云的作品。

《陆士龙文集》保存了他《与兄平原书》三十五封；其中第八封说：

云再拜，省诸赋皆有高言绝典，不可复言。顷有事复不大快，凡得再三视耳。其未精，仓卒未能为之次第。省《述思赋》，流深情至言，实为清妙，恐故复未得为兄赋之最。兄文自为雄，非累日精拔，卒不可得言。《文赋》甚有辞，绮语颇多；文适多体，便欲不清，不审兄呼尔不？《咏德颂》甚复尽美，省之惻然。然《扇赋》腹中愈首尾，发头一而不快，言乌云龙见，如有

不体。《感逝赋》愈前，恐故当小不。然一至不复灭（一作减）。《漏赋》可谓清工。兄顿作尔多文，而新奇乃尔，真令人怖，不当复道作文。谨启。

在这封信中，陆云把《文赋》跟陆机的《述思赋》、《咏德颂》、《扇赋》、《感逝赋》、《漏赋》等，列为同时期的作品；陆云也因此而惊叹陆机“顿作尔多文”！

如果我们对陆机这五首赋中的三首的写作时间考辨清楚了，那么，《文赋》的比较确切的写作时间也就显示出来了。

先辨《述思赋》。

陆云在给陆机的第十八封信中提到他自己写作的《愁霖赋》和《喜霁赋》。《陆士龙文集》卷二《愁霖赋》有序，说是“永宁三年夏六月”作，因永宁没有三年，这里应该是永宁二年。陆云在《喜霁赋序》中说：“余既作《愁霖赋》，雨亦霁，昔魏之文士，又作《喜霁赋》；聊厕作者之末，而作是赋。”可见《愁霖》、《喜霁》二赋都是永宁二年六月所作。

同一封信中，陆云又说：“云再拜，海《岁暮》，如兄如（衍文）所海。云意亦如前启，情深言至；《述思》自难希。”陆云的《岁暮赋》似在读了陆机的《述思赋》以后才写成的，即《述思赋》早于《岁暮赋》。

据陆云的《岁暮赋序》所说的，此赋写于永宁二年。陆云的上述三首赋都作于永宁二年；那么，陆机的《述思赋》也是写于永宁二年或稍前一点。因为陆云与陆机多次讨论文章的写作，时间的相隔都不很远。

再辨《咏德赋》。

上引陆云信中所说的《咏德赋》虽已不传，但《晋书》卷三十六《张华传》载：“初，陆机兄弟，志气高爽，自以吴之名家，初入洛，不推中国人士，见华一面如旧，钦华德范，如师资之礼焉。华诛后，作诔，又为《咏德赋》以悼之。”可知《咏德赋》写于张华死后，张华死于永康元年（公元300年），是年陆机四十岁。

再辨《感逝赋》。

《感逝赋》，又叫《叹逝赋》，载于《陆机集》卷三。这篇赋有一序，明确说明写作时间。序中说：“昔每闻长老追计平生同时亲故，或雕落已尽，或仅有存者。余年方四十，而懿亲戚属亡多存寡，暱交密友亦不半在。或所曾共游一涂，同宴一室，十年之内，索然已尽。以是思哀，哀可知矣。乃赋。”由此可知，《叹逝赋》写于永康元年（公元300年）庚申，是陆机四十岁时的作品。

如上所述，《叹逝赋》、《咏德赋》及《述思赋》，都作于永康元年至永宁二年之间，那么，《文赋》也是永宁元年左右所撰，陆机四十一岁。（注）

如果我们再联系到陆机的生活道路和创作情况来考察，则更为明确。

陆机二十岁的时候，晋兵“大举伐吴”，吴国灭亡。他

---

注：参看钱钟书《管锥编》第三册第1206—1207页。《学原》第二卷第一期速欽立《〈文赋〉撰出年代考》。

在国破家亡的时刻，写了《辩亡论》，这是可以理解的。而在二十岁的时候，陆机的文学创作生涯刚刚开始，很难设想一个没有丰富的创作经验的年青人，能写出如此深刻的创作经验谈的《文赋》！在这以后的二十年，当陆机进入年富力强的壮年期，已经饱历人生的忧患和创作的甘苦之后，特别是在永宁元年到太安二年这二、三年时间里，因诸王特别放恣，攻伐杀戮频繁，陆机虽然先后为中书郎、平原内史，但却有着十分凄厉的慨叹：“天步悠长，人道短矣，异途同归，无早晚矣！”（《思亲赋》）思念他弟弟陆云，同有囹圄之悲以及人道短缺的恐惧。在这期间，陆机曾经赋闲一年多，因而有相对安静的时间，又有世道淡薄的心境，创作也多，陆云的《与兄平原书》三十五通，也写于此时，他与陆云通讯讨论文章得失，因而激发起对自己、对时代的创作经验总结的激情，于是写作《文赋》。综观陆机的一生，也只有在这个时候才有可能写作《文赋》。

以上所作的简略的考订，是十分必要的。因为，只有确定了《文赋》的写作时间，我们才能透过《文赋》去比较全面地认识陆机，去评价魏晋以来特别是陆机自己创作的基本倾向，去估价《文赋》的理论贡献。

## 二

《文赋》好比是一扇心灵的窗口，从这里可以窥视到作者对文学艺术的炽热的激情和执着的爱好。



《文赋》，从理论的角度来看，是一篇细密而深刻地论述文学问题的理论文章。从赋体的角度来读，它却是一篇富有文采和形象性的文学作品。我们读《文赋》，既可以全面地了解陆机的文学主张，也可从中了解陆机的风格和人品，体味到他一生在政治旋涡中所遭受的坎坷历程，看到他在翰墨生涯中所得到的甘苦。而陆机的文学主张，与陆机的为人，又是相一致的。过去研究《文赋》，着重于前者，固然正确，但忽视了后者，不能不说是一种缺陷。刘勰在《文心雕龙·知音》中说：“世远莫见其面，覩文辄见其心。”读《文赋》也是应该遵循刘勰所指出的欣赏文学作品的共同规律的。

陆机是三国吴、晋之间，即公元三世纪后期至四世纪初期的—位重要作家兼文学批评家，他生于公元261年（孙吴景帝永安四年），死于公元303年（太安二年），在他一生的四十三年中，因出身豪门贵族，少年得志，“为牙门将”。当他二十岁时吴国被晋灭亡后，他在国破家亡的悲痛情绪中，“退居旧里，闭门勤学，积有十年”，把自己的积愤写下《辩亡论》二篇。公元289年（晋武帝太康十年），陆机二十九岁时，同弟陆云被逼入洛阳，陆机在《赴洛道中》—首云：“总警登长路，呜咽辞密亲。借问子何之，世网婴我身。”可见他赴洛并非自愿。他深怕宦途艰险，世网攫人，无法自拔；他在诗中也流露出这种情绪：“虎啸深谷底，鸡鸣高树巅。哀风中夜流，孤兽更我前。悲情触物感，沉思郁缠绵。伫立望故乡，顾影凄自怜。”他在此后的十多年的历程中，在险恶的政治风波中不能解脱，—种“慷慨含辛楚”的思想感

情，萦绕着他的后半生。他曾任太子洗马，又转著作郎，后又拜郎中令，入洛阳以后，元康六年，入为尚书中兵郎，转殿中郎，后赵王伦篡位，陆机为平原内史。公元303年（太安二年），成都王颖引兵屯朝歌，以陆机为后将军河北大都督，陆机固辞不许，最后兵败被诬，受害身亡。临死前叹息曰：“华亭鹤唳，岂可复闻乎！”据敦煌残卷《修文殿御览》引《晋八王故事》：“华亭，由拳县郊外野也，有清泉茂林，吴平后，机兄弟素游于此，十有余年。”陆机在政治漩涡中过着动荡不安的生活，临死之前，发出“华亭鹤唳”之叹，过去幽静的郊野读书生活，使他至死不能忘怀。这是他对“人道险而难”（《君子行》）的喟叹，是他对闲逸的郊游生活情趣的留恋。陆机的《文赋》，正是从一个侧面充分地表达了他的思想风貌和他的“文心”，是一篇酣畅的作家的内心自白。

我们从《文赋》的折射中，可以曲折地领略到陆机的创作个性。

对于陆机的创作，最早作出概括性评价的是陆机钦为德范、张华来华，张华说陆机的作品有楚辞的风范（陆云《与兄平原书》第十五书）。刘勰说陆机“才欲窥深”（《文心雕龙·才略》）。章炳麟说陆机的创作不尚浮艳，无荡肆之言，有“《小雅》、风人之绪”（《陆机赞》）。

这些说法，概括起来，指出了陆机创作特征的两个重要方面。一方面是由风、骚传统所体现的“情以物迁”、感物言志的创作原则。创作的冲动是因客观事物的感发而引起：“遵

四时以叹逝，瞻万物而思纷；悲落叶于劲秋，喜柔条于芳春。”客观事物唤起内心的变化，陆机于此而同时又入乎其内地神游于物：“澄心凝思”，“心慄慄以怀霜，志眇眇而临云。”他自己所作的《叹逝赋》、《思归赋》、《述思赋》，正是这样的一种创作心理的具体体现。陆机和陆云作赋，都是“感万物之既改，瞻天地而伤怀，乃作赋以言情焉！”（《岁暮赋序》）这样看来，陆机的创作，既有风骚的感物言志、心怀愤思的传统，也吸收了司马相如的“控引天地，错综古今，忽然如睡，焕然而兴”的“赋家之心”（《西京杂记》），陆机在《文赋》中说：“精鹜八极，心游万仞”，“观古今于须臾，抚四海于一瞬”，“笼天地于形内”，也就是这种想象和联想的“赋心”；这种“赋心”，好比我们今天说的创作过程中形象思维处于十分活跃的阶段所显示的灵感。另一方面是他创作的“窥深”特征，跟刘勰这种概括相近的是《世说新语·文学》中讲的陆机的作品“深而芜”，这都是肯定陆机创作中所体现出来的“深”的一面。

《文赋》显示了陆机在复杂艰险的政治生活中，仍然保留着魏晋时代文士进行文学创作时闲逸的情趣和他对人生的执着的追求。

如前所述，陆机到洛阳以后，永宁元年以前，一直在官场中，皇皇然，没有过上安宁的日子；从永宁元年四月，赵王伦被诛，陆机免职，到太安元年任命为平原内史，当中只有一年多时间赋闲。直到被诬陷杀身，陆机是没有清闲过

的！

陆机虽然长期过着纷繁多变的戎马生涯和处理繁忙的政事军机，但他始终“游文章之林府”，留连于创作与欣赏的乐趣之中。陆云给他三十五封信讨论文章的得失是一个有力的证明。他在《文赋》的开头和结尾处，一再讲到创作过程中所感受到的特殊的兴味，“伊兹事之可乐，固圣贤之所钦”，讲创作的欢乐，本来是圣贤所推崇而向往的。“文徽徽以溢目，言泠泠而盈耳。”写出了文采灿烂满目，音韵泠泠盈耳的好作品。“配霏润乎云雨，象变化乎鬼神。”乐趣是无穷的！沉浸于创作的情趣中，是魏晋文人风度的突出表现，这也从另一方面体现了《文赋》的鲜明的时代色彩。在魏晋时代复杂的政治生活中，文人一卷入政治漩涡，就如临深渊，如履薄冰；他们只有在文学艺术之林寻求精神上的慰藉。陆机的情趣，在他所处的历史阶段中是颇有典型意义的。

这种行文欢乐的感受，是跟他对生活的认识及对人生的执著追求相联系的。我们知道，曹魏以来，人们都在探求人生的真谛，追求人生的不朽，曹丕首先把文章视为达到人生不朽的手段。他在《典论·论文》中说：“年寿有时而尽，荣乐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无穷。”也因此，曹丕身为皇帝，在政治上、经济上的诸多建树，远不如他的诗文有名。他一诗（《燕歌行》）一文（《典论·论文》），把他政治上的功过都淹没了。陆机也是在这种社会思潮中一起涌进。他经常感叹：“天道夷且简，人道险而艰”

（《君子行》），“天道有迭代，人道无久盈”（《齐讴行》），  
“天道信崇替，人生安得长！”（《门有车马客行》）“天道  
有迁易，人理无常全”（《塘上行》）。人生、人理在与天  
道的变化对比中显得短暂而残缺！即使如此，人生是有意义  
的，人生是值得留恋与追求的：“慷慨惟平生，俯仰独悲  
伤。”（《门有车马客行》）人生的意义在什么地方呢？“抚  
枕不能寐，振衣独长想。”（《赴洛道中作》）陆机在曹丕  
文论的基础上得出结论：“被金石而德广，流管弦而日新”  
（《文赋》）。如果说，曹丕考虑的是“文章”的久远和他  
对人生的不朽的追求相联系，那么陆机却自觉地从文学创作  
的角度，真正认识到，写出了优秀的作品，刻于金石能使美德  
广为流传，而播于管弦，它的声调又长久悠扬，万古长青。  
在《文赋》中还有“森竖”“翰林”的说法，认为写出了完  
美的作品，就象大自然播散草木香花的芬芳，展现树枝春条  
的柔美一般，作家浓郁的丰神，也鲜明美丽如风飞飘立地跃  
然文坛，“与天地乎共育”，和天地共生存了。这样看来，  
人依托于优秀的作品，不也使短暂而残缺的人生可以与长久  
而完美的天道相一致了吗？因此，陆机对文学创作所产生的  
乐趣，就有了深一层的意蕴，也见出陆机有高一着的见地。

《文赋》展现了陆机博厚精深的文学修养和突出的创作  
才华。在这篇“论作文之利害所由”的赋里，他横亘古今地  
对文学创作过程作了形象的比喻和描绘，对创作技巧作了  
符合实际的概括，对魏晋时代文章的弊病作了细密的分析与  
合理的批评，对文章的立意、布局、结构、剪裁到修辞、音

韵等，都有深入的阐述，而在这过程中，无不表现了他自己独到的见解，反映了这一个时代人们对文学创作的自觉的认识和要求。陆机才华横溢、思维敏锐和文学修养深厚，是史书上多所记载的。“机善属文”，这使当时文坛元老张华“见其文章，篇篇称善”（《世说新语·文学》），刘勰惊叹“士衡才优”（《文心雕龙·铨裁》），钟嵘也认为陆机“才高词赡，举体华美。”（《诗品》）李善注《文赋》引臧荣绪《晋书》说陆机“妙解情理，心识文体。”《晋书·陆机传》也说他“天才秀逸”。因此，《文赋》中所表现的“耽思傍讯”、“丽藻彬彬”这一系列的才华并不是偶然的。

我们从《文赋》中所论“文心”窥测到人心，了解到陆机的人品、气质、学识与才性。明清之际，某些古诗选家，囿于个人的艺术偏见，对陆机的评价十分偏颇。如认为陆机“衷情本浅”（陈祚明《采菽堂古诗选》卷十）、“意欲逞博，而胸少慧珠”（沈德潜《古诗源》卷七），因而体现在创作中，则“造情既浅，抒响不高”、“敷旨浅庸，性情不出”（陈祚明）等等。这种议论，不讲事实根据，完全不符合《文赋》中所反映的陆机的实际情况，也缺少魏晋六朝时期批评家们评价陆机时所表现的那种实事求是的态度。这是不足取的。

### 三

《文赋》中所提出的若干重要的文学理论问题，既是陆机自己以及当时文坛上创作实践的概括，同时又指导着这以后的文学实践。

第一，在理论上明确提出“缘情”说，把中国抒情诗的创作引向符合文学内在规律的轨道。

《文赋》的重点，是论述作家的主观感情对创作所起的作用。陆机特别提出“诗缘情而绮靡，赋体物而浏亮”；在我国文艺理论史上，第一次提出“缘情”说。缘情即因情而生文；缘情，从创作过程来看，也即抒情。诗缘情之论滥觞于《尚书·尧典》之“诗言志”。汉《毛诗序》对“诗言志”的含义作了引申和发展。指出诗的特点是“吟咏情性”，是“情动于中而形于言”。但同时又强调“发乎情止乎礼义”。要求诗要达到“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的政治目的，诗中的情要受政治教化和礼义道德这样的一些外在因素所规范。到了陆机的《文赋》，总结了五言诗创作的艺术规律，明确地提出“缘情”说。

《文赋》以“缘情”说为中心，论述文艺创作中的诸多问题。如“每自属文，尤见其情”，讲自己进行创作时，就能体会到创作情思的甘苦。如“情瞳眈而弥鲜，物昭晰而互进”，说明在构思成熟的时候，所要抒发的内在思想感情由渐渐清晰而趋于鲜明，所要描绘的外在的物态形象也清楚顺

适地交错而来。如“信情貌之不差，故每变而在颜”，讲“情动于中而形于言”，内情的触动与外貌的表现相一致，心中的变化必然表现在颜面上。如“言寡情而鲜爱，辞浮漂而不归”，指出言语缺乏真实的情爱，用辞漂浮不定而无所归附，这样一来，感情不真挚，作品就难于感人。如“及其六情底滞，志往神留”，讲作家的喜、怒、哀、乐、好、恶的情思，一旦停滞的时候，心志虽然想前往而精神却停留不动了。如“是以或竭情而多悔，或率意而寡尤”，指出有时竭尽情思反而很多遗憾，有时信笔写出反倒很少误谬等等。整篇《文赋》，中心是讲“属文”时的“见其情”之“情”，“缘情”一说，贯串于文章的始终。陆机在理论上明确提出了文艺创作的核心问题，肯定了诗歌抒情化的本质特征。朱自清先生在《诗言志辩》中指出：“陆机《文赋》第一次铸成‘诗缘情而绮靡’这个新语。‘缘情’这词组将‘吟咏情性’一语简单化、普通化，并隐括了《韩诗》和《班志》的话，扼要的指明了当时五言诗的趋向。”

《文赋》中所说的“缘情”是将“情”和“物”相联系而加以论列的。如《思归赋》中二句，是将“缘情”和“触物”对举；“情”指内心的感情和心境，“物”则是客观存在的外物。他认为客观的物是很复杂的：“体有万殊，物无一量，纷纭挥霍，形难为状”，作家创作时，在处理“物”与“情”的关系时，要做到“意司契而为匠”，主张在“情”的制约下务期“穷形而尽相”。“情”既受客观事物的触发而产生，客观事物又通过“情”而得到充分的体现，即《文



赋》中所说，在诗人的形象思维的过程中，“情瞳眈而弥鲜，物昭晰而互进。”陆机的这个观点，刘勰在《文心雕龙·诠赋》中发挥得更为完整。他说：“原夫登高之旨，盖睹物兴情。情以物兴，故义必明雅；物以情观，故词必巧丽。”他辩证地指出事物的两个方面，即因“物”以兴“情”和以“情”去睹“物”，客观事物借“情”的感受而表现出各种不同的色彩。陆机和刘勰的论述，在一定程度上把握了中国古代抒情诗形象塑造的基本特征，即诗人往往由于客观自然物的感发，于是对客观事物进行概括，并借助于客观自然界的物象作比兴，抒发自己的感情，表现主观的感情形象。

《文赋》以“缘情”说为中心，把文艺创作中许多重要问题一环扣一环地相继提出，全面地论述了文学艺术的美的创造。

第二，在总结前人创作经验和自己创作实践的基础上，提出了艺术美的创造，关键在于艺术构思。

艺术创作中的抒情写意，必须通过艺术构思来进行。因为只有经过艺术构思，作家才能对生活素材进行艺术概括，才能为自己所要表现的思想内容找到合适的表现形式，才能运用形象思维的手段塑造艺术形象。艺术构思也是艺术家赖以对审美客体进行再认识的重要的艺术手段。

陆机以为，构思之所以产生，是由于作家对客观事物的感受；而这种感受的触发，有直接的，也有间接的。他说：“伫中区以玄览，颐情志于典坟。遵四时以叹逝，瞻万物而思纷。悲落叶于劲秋，喜柔条于芳春。心懔懔以怀霜，志眇眇而临